

# 评“菲利普斯曲线”论

吴世泰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以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为主要标志的通货膨胀以及大量工人失业，是引起人们普遍重视和极为关心的经济现象。它们的成因是什么，对劳动人民有利还是有害，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形色色的用以解释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的理论也就应运而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曾经名噪一时的“菲利普斯曲线”论，就是当代西方通货膨胀和失业理论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种。它有着很大的欺骗性和辩护性。

##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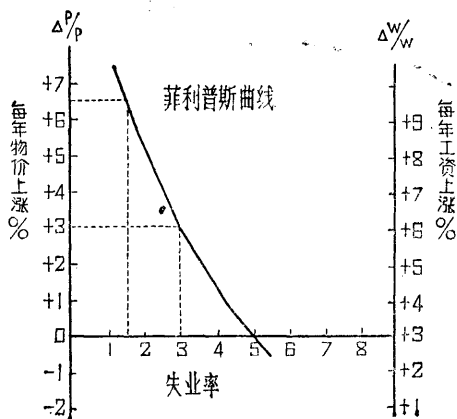
在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无论是凯恩斯学派，抑或是货币学派与供应学派，只要谈到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几乎无不涉及“菲利普斯曲线”。所谓“菲利普斯曲线”，就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过数学上的座标图来表示资本主义国家中物价上涨率(或通货膨胀率)同工人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交替换位”关系的曲线。由于这条“曲线”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最先炮制出来的，因此取名为“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的炮制者菲利普斯于1958年11月在英国《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他在其中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根据传统庸俗经济学关于

货币工资决定于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关系的理论，列出了一个用以表现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函数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然后就英国1861—1957年将近一百年间的有关统计资料，利用统计学上的一些计算方法，在座标图上绘制出了一条表示失业率与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换位”关系的曲线，以表示失业减少，工资上涨；反之，失业增加，工资下降。这就是原来意义上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认为，假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幅度不变，则英国货币工资率变动的百分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劳动力的失业率以及失业的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把本文附图中从右端纵座标表示的每年货币工资上涨率与横座标表示的失业率对照分析，就可看出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互相替换的关系。

由于当代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时，往往强调工资的因素，认为工资的增加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引起物价上涨的根源。这种理论的鼓吹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有工会的力量存在，工会能操纵劳工市场上的价格，因而在没有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甚至在存在着严重失业的条件下，也能够迫使企业主即资本家同意让工人工资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从而导致商品成本增加，并引起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以后，工人又会再度要求提高工资，从而再度引起物价上涨，如此循环往复，就会造成所谓“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因此，原来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

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换位”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经过修改和变动，又可以用来表示失业率和物价上涨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换位”关系。下面这份图示就是目前通常所讲的典型的“菲利普斯曲线”：



图示左边表示每年物价上涨率的纵座标要比右边表示每年工资上涨率的纵座标高三三个单位，如物价上涨率为3%时，则工资上涨率为6%，这主要是用来说明物价上涨是由工资上涨引起的，是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所造成的。在座标图上，曲线表现为自左向右下方倾斜。当失业率为1.5%时，年度物价上涨率为6.5%；失业率为3%时，年度物价上涨率同样为3%；当失业率上升到5%时，则物价便停止上涨。

“菲利普斯曲线”图示主要是说明如下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物价上涨率与失业率之间互为反方向变动，要减少失业或实现充分就业，就必然会出现较高的物价上涨率；反之，要降低物价或稳定物价，那就必须以较多的工人失业为代价。换句话说，即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对于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并非坏事，而是有利于帮助他们实现充分就业的一种善举。对此，凯恩斯的门徒、“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曾经公开宣称：“价格上升通常可以带来高度就业。处于轻微的通货膨胀中，工业之轮开始得到良好的润滑油，产量接近于最

高水平，私人投资活跃，就业机会多。历史上的情况便是如此。”他并且由此断言：“在失业的时期，即使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增加会给价格带来一些上涨的压力，它也被认为是一件好事。”（《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3页）总之，在菲利普斯、萨缪尔森等人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工人不愿意失业，那就必须同意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反之，如果他们要反对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等待他们的就只有失业，或者说他们就必须忍受极高的失业率，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 (二)

“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貌似“科学”，实则荒谬已极。我们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资本主义现实状况，略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其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反动实质。

首先，它歪曲和掩盖了广大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真正原因。按照“菲利普斯曲线”论的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互为反方向变动，失业的增多是由于物价水平过低引起的。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不。我们历来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内在的因果联系。它们两者反映的矛盾不同，决定的因素也不同。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失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业问题也必然日趋严重。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经济危机和停滞时期由于生产的下降或发展滞缓必然造成失业加剧以外，还有以下两个直接原因：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机器体系的应用，工艺过程的改进，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使工人遭到排挤而失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

多的生产资料，这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自己就业的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别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气力，也就越没有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不断产生工种的变动和工人的流动，这也会形成暂时的甚至较长期的失业。马克思对此也作过明确论述，他指出：“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4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深刻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造成工人失业的直接原因，而且还运用其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学说，着重阐明了工人失业人口的增加是由于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追加的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地减少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条件分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它们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是必然会越来越提高的，反映这种技术构成的资本有机构成，即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与用于购买工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必然会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越来越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对工人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取决于总资本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其中可变资本的大小，因此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导致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相对减少，也就必然造成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从而形成

大量的劳动力过剩，促成工人失业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工人失业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它是由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所决定的。至于失业率的提高或降低，这又主要决定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各个阶段的更替。一般来说，在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急剧减少，大批工人被解雇而成为失业者，失业率因而会提高；反之，当资本主义经济由复苏到高涨阶段，对劳动力的需求又会突然增加，从而使失业率有所降低。至于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它们只不过是在纸币流通条件下由于纸币供应量超过了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而引起的纸币贬值现象，这与工人失业率的提高或降低根本没有任何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菲利普斯曲线”论的鼓吹者们硬把这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硬拉在一起，断言工人失业率的提高或降低是由物价水平的降低或提高所引起，这显然是有意歪曲和掩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造成大量工人失业的根本原因，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给广大工人造成的失业灾难开脱罪责。因此，这种理论的辩护性和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菲利普斯曲线”论掩盖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资产阶级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真实目的和根本动机。前面已经介绍，菲利普斯、萨缪尔森等人一再鼓吹通货膨胀有利于帮助工人实现充分就业或降低失业率，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乃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不得已才采取的一种货币政策。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列宁曾经明确指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它使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而大发横财。”（《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3页）列宁的这段论述，正是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资本主义国家通货膨胀的阶级实质，同时也是对“菲利普斯曲线”论者鼓吹的通货膨胀有利于帮助工人充分就业的谬论的有力批判。众所周知，通货膨胀既然是由于流通中的纸币数量过多而造成的，因此引起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就只能是国家滥发钞票，致使纸币的供应量超过了实际需要量而愈来愈多地拥塞于流通过程之中。资产阶级国家这样搞的目的，不仅是企图以此来干预经济发展过程和刺激经济增长，更重要的乃是因为通货膨胀是垄断资本对劳动人民加强剥削和掠夺的重要手段。因为当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当局发行纸币时，它可以按照纸币的票面价值或尚能代表的较高的价值量来支付使用。而当纸币转入劳动人民手中时，由于纸币贬值和物价上涨，他们就已不能再按照纸币原来所代表的价值去购买商品。国家发行纸币时，一定数额纸币所能代表的价值量和劳动人民用其购买商品时所能代表的价值量，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并不相等，有时甚至差别很大。这其中的差额，既是劳动人民遭到的损失，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国家从通货膨胀中捞到的额外收益，而资产阶级国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它从通货膨胀中所得到的收益当然也就直接间接必然会落入垄断资产阶级腰包之中。不仅如此，从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对于垄断资产阶级可有如下许多好处：第一，通货膨胀可以使垄断资本家大大提高对于工人的剥削程度。这是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工人工资的提高一般总是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这就必然造成工人实际工资下降，资本家的利润相应提高，从而使资本对于工人的剥削率相应提高。第二，在通

货膨胀的情况下，垄断资本家可以利用商品价格的波动，大搞囤积居奇和进行黄金、外汇和有价证券的投机活动，从中牟取暴利。第三，通货膨胀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某些垄断资本家的债务负担，使之坐收其利。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进行其榨取剩余价值的经营活动，仅靠自有资本往往不能维持正常需要，而必须经常依靠大量的贷款。在他们取得贷款以后，由于通货膨胀和纸币贬值，在清偿债务时他们就可以用已经贬值的货币按原来的债款数额归还债权人，从而使借款期内货币贬值的差额归他们所占有。当然，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贷款的利息率也会提高，但利息率的提高一般是不会超过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纸币贬值的幅度的。此外，通货膨胀最终还会导致货币对外汇率的下跌，这也会给垄断资本家加强出口、实行外汇倾销创造某种有利的条件。总之，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对于垄断资产阶级是有利可图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通货膨胀就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摇钱树”，是他们发财致富的重要源泉。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之所以卖力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其真实目的和根本动机就在这里。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董事长小盖洛德·弗里曼对此也供认不讳，他曾这样说过：“我们大多数人喜欢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不管我们口头上怎么说。政治家、劳工领袖、工商业家，偶然连我们这些银行家，都是如此。我们都喜欢拿出漂亮的报告卡，而通货膨胀使我们的成绩显得更好看一些。”（《纽约日报》1970年4月8日）这一出自一个大垄断资本家之口的坦率自白，最好不过地表明了资本主义通货膨胀究竟对谁有利，为谁服务。由于通货膨胀决不可能创造国民收入和增加社会财富，因此垄断资本家有所得，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必然有所失。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不仅在生产领域里要为剥削者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创造更多

的剩余价值,遭受严重的剥削,而且在流通领域里还会由于赋税增加、纸币贬值而受到进一步的掠夺。“菲利普斯曲线”论者对此不仅讳莫如深,而且大讲特讲通货膨胀如何在为工人谋利和造福,这恰好充分暴露了他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忠实辩护士的丑恶嘴脸。

再者,“菲利普斯曲线”论把物价上涨率与工资上涨率联系起来,断言物价上涨是由工资上涨所引起,是工资上涨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的结果,这也是极端荒谬的,并且是与战后历史事实根本不符合的。诚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与物价是有联系的,但决不是工资提高引起物价上涨,而是物价上涨应该使工资随之提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不过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工人所得的工资是要用来购买消费品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如果物价上涨以后而工人的工资不能随之提高,则工人的名义工资虽然未变,但实际工资水平就会下降,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难以维持。正是由于物价上涨才引起工资提高,所以在时间上两者就有先后,总是先有物价的猛烈上涨,然后才有工人为争生存而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这种耳闻顺序上的先后,完全可以从物价上涨对工资成本的影响上反映出来。由于物价上涨以后,工资要隔一段时间才能提高,其结果在这段时间里单位商品的工资成本就会下降,从而使资本家的利润有所增加。在工资随着物价的上涨而有了提高以后,资本家又会以工资提高、成本增加为借口要求再提高物价。因此,“菲利普斯曲线”论者鼓吹物价上涨是由于工资提高所引起,这完全是倒果为因。通货膨胀本来是垄断资产阶级用以加强对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手段,劳动人民是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如今却变成通货膨胀的所谓“罪魁祸首”,成了通货膨胀制造者们谴责的对象。因此,“菲利普斯曲线”论的荒谬性和反动性在这里更是暴露无遗。菲利普斯等人炮制这种谬论,其目的就是要为垄

断资产阶级进一步剥削和压榨工人制造口实。因为按照这种谬论,既然物价上涨是由工资增长引起的,因此为了不使物价上涨,当然就有理由反对工人提高工资,推行其所谓“冻结工资”的反动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不让工人的工资随着物价的上涨而提高,这就必然导致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使工人所受到的剥削日益加重。在这个问题上,凯恩斯倒是透露出过一两句真话。他早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极力主张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他认为:“当雇主们设法压低货币工资时,其所遭遇之抵抗,比之当物价上涨,真实工资逐渐下降时,所遭遇之抵抗,要强烈得多。”他并且断言:“只有愚蠢之徒才会挑选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而不挑选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23、226页)所谓“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通货膨胀政策。凯恩斯这段论述,公开供认通货膨胀是为了降低工人实际工资才实行的,而并不是反过来,由于工资提高才搞通货膨胀。这确实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内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所谓“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云云,这也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长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熬煎下,逐步觉醒过来,为提高实际工资作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使某些年份的实际工资有所增长,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即使在西方国家实际工资有所增长的年份,这增长也是极其有限的,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仍然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据统计,从1954年到195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体成员国中,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4.8%,而工

人的实际工资平均每年只增长3.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在这个时期里提高了34.3%，显然，工人所受剥削的程度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事实胜过谎言，这是“菲利普斯曲线”论者难以辩解的。

### (三)

“菲利普斯曲线”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因此它的彻底破产也是不可避免的。

按照“菲利普斯曲线”论，通货膨胀与失业呈互为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两者不可能同时并进，特别是不可能同时处于较高的水平上，它们之间只能是此长彼消或此消彼长，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带来的只能是较低的失业率以至于完全实现充分就业。在“菲利普斯曲线”图示上，通货膨胀率上升到6.5%时，失业率只能是1.5%。但是战后严酷的现实却与上述论断相反，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生产停滞、失业率大大增加与物价猛烈上涨并存的“滞胀”局面，在事实上彻底宣告了“菲利普斯曲线”论的破产。以美国为例，1975年该国失业创战后最高记录，达到783万人，失业率上升为8.5%，但该年的消费物价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年上涨率高达9.1%，是战后消费物价上涨的第二个高峰。1976年及以后的各个年度，美国的失业率及消费物价上涨率都分别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1979年美国消费物价上涨率为13.3%，1980年第二季度还猛增至18.3%。如果按照“菲利普斯曲线”推算，这两年美国应该是大大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情况完全相反，1980年第三季度失业人数高达801万人，失业率达到7%。特别是从1981年11月份开始，失业人数已突破900万，失业率上升为9%左右。并且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远不是完全的。据“劳联—产联”一个研究机构指出，在

美国，由于长期不能就业感到失望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未向政府登记的所谓“隐藏的失业者”尚有100万人，此外还有500万人则因为找不到全天的工作而只能算是部分就业。这样，近年美国失业和半失业人数估计约有1500万之多，失业率实际上早已突破“两位数”。面对七十年代以来“滞胀”并存的局面，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菲利普斯曲线”论失灵。美国经济学家加迪纳·米恩斯在《并发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现象》一文中指出：“通货膨胀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失业也是个老问题，在二十世纪则表现得似乎更尖锐。但是通货膨胀和失业过多同时并发倒是一个比较新的重要事件。按照传统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但是这种公认的理论并不能合情合理地解释今天在失业过多状态下物价普遍上涨的现象。”他认为：“在最近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通货膨胀发生在职工大量失业、机器大量闲置的情况下。……很明显，现实的经历和传统的理论相互矛盾，需要新的理论来解决新的问题。”

（美国《挑战》杂志1975年9、10号，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8页）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也公开断言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替换关系充其量也只是存在于短时期内的暂时现象，“而却不存在持久性的交替关系”（《货币政策的作用》，同上书第123页）。

值得注意的是，“菲利普斯曲线”论虽已宣告破产，但是其流毒并未消失。目前在西方世界至今仍有人继续贩卖这种蹩脚货。去年11月，美国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在劳工部公布失业人数统计材料以后竟公然向记者宣称：目前美国之所以有这样高的失业率，“这是为了降低通货膨胀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的这种乞求于“菲利普斯曲线”论而作出的难以自圆其说的辩解，当即引起美国公众的

愤慨和反驳。事过不久,《劳联产联新闻》专门找出1980年4月23日里根在竞选辩论中的如下一段话来反驳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的说法。里根当时为了笼络人心,多拉选票,洋洋得意地宣称:

我不相信只能由经济衰退来代替通货膨胀,我想,这是老式的经济学。我不认为你一定要用失业去做交易,附带提一下,卡特总统在当候选人时曾说,他将永远不会以增加失业来向通货膨胀作斗争。现在卡特总统在经济咨文中却说,作为反通货膨胀斗争的一部分,可以让失业率增加1.5%至2%。这是自己害自己。因为失业每增加1%,你就因为不能向这些失去工作的人收税和还要向他们提供福利而使联邦赤字增加250亿到290亿美元。

里根上台以前发表的这段演说,现在读来颇堪玩味,它至少可以说明,在美国统治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看出,依靠“菲利普斯曲线”论再也不能继续欺骗广大群众的视听了。正是由于里根懂得这一点,所以他才抓住批判“菲利普斯曲线”论借以攻击自

己的政敌卡特。至于里根上台以后,又不实行其诺言,这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下,政府政策的选择只能处于顾此失彼、进退两难的境地。现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谁上台执政,都不可能有什么能够真正治愈资本主义经济痼疾的回春妙药,这是毫无疑问的。

总之,“菲利普斯曲线”论纯全是辩护性的和反科学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它既为资本主义通货膨胀辩护,也为工人失业辩护。它把通货膨胀和工人失业都说成是工人阶级本身的罪过,工人阶级既要为通货膨胀承担责任,也要为自己的失业承担责任;同时命运注定工人阶级只能在这两者的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轮回之中忍受熬煎。对于这种露骨地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以维持垄断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而捏造出来的谬论,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给予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 王安石与韩琦

彭海

对于王安石《和王乐道烘虱》一诗,有说该诗作于熙宁初年。当时王陶上章弹劾韩琦,参告韩琦上朝不押班,违反朝廷规章。王陶《烘虱》一诗,也作于此时,披露了诗人要去除韩琦等一班官僚蠢蛋的愿望。王安石在《和烘虱》诗歌中,作了响应。

如果真是这样,这必然是王安石一大罪状。而在王安石两次罢相前后,反对王安石新政的言官和大臣们,却没有对于王安石烘虱诗进行抨击的。相反,在王安石文集里倒有了《上扬州韩资政启》(在淮南任签书判官时作)、《贺韩魏公启》(熙宁年间)、《韩忠献挽辞》(元丰年间)等诗文。这些诗文都写出了王安石对韩琦的敬重感激,尤其是《贺韩魏公启》的写作时间,正是王

陶参奏韩琦不赴文德殿押班为跋扈以后。

笔者认为,王陶的《烘虱》和王安石的《和王乐道烘虱》,是他们在嘉祐年间一齐在都城任职时的唱和诗,而非写作于熙宁初。韩琦的确反对过王安石新政,那是熙宁三年推行新政以后的事,与王陶参奏韩琦无关。而且王安石对于反对过他新政措施的长辈,也还保持敬重。欧阳修反对过新政,但在他任相中或任相后选编的《四家诗集》里,就仍然选集了欧阳修的诗作一百二十五首,与杜甫、李白、韩愈三家并列。因而王安石写给韩琦的挽诗里所说的“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輶”,就不能只看做是应酬文字,而是有着丰富的感情内容的。